

李攀龙唐诗选本考论

金生奎

作为明中期著名文学复古派“后七子”的领袖人物,李攀龙“操海内文章之柄垂二十年”^①,其影响力不仅体现于诗歌创作层面,也反映在诗学批评领域。不过,李攀龙并无专门的诗学论著^②,“评诗少见笔札”^③,其文集中涉及诗文评论的,主要是一些信札、序跋文字,总共也只有15条^④。李攀龙的诗学批评思想主要反映于他编选的诗歌选本之中,即《古今诗删》三十四卷及由其而来的《唐诗选》七卷^⑤。因而,关于这两种诗选特别是《唐诗选》刊刻情况的考订,对体认李攀龙诗学思想及其影响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对明确地把握明嘉靖末年之后诗学风尚不无帮助。

①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428页。

②今传世有《诗学大成》、《诗学事类》、《韵学事类》等书署名李攀龙所著,都是伪托,《四库全书》相关提要辨之甚明。

③王世贞:《艺苑厄言》卷四,见《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55页。

④许建崐:《李攀龙文学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第315-316页。

⑤《唐诗选》乃是后人将《古今诗删》唐诗部分的十三卷按照诗体的不同合并为七卷,并在选诗数量上进行了一定的增删后而独立行世的。另外,乾隆年间修纂的《山东通志·艺文志》中有记载云:“《评杜诗钞》,李攀龙撰。”又引沈珩一段关于此书的“识语”：“癸丑,予在长安,同年天雄孔雪厓郁豪于诗,见其枕中一帙甚密,则于鳞《评杜诗钞》。天雄孔使得之书林废篋,梓之。此本人所未见,予从雪厓丐有之。诗仅三百首,点次切密,评鹭字极质约,无浮文,真先雅风格。按所最赏心处,大较奇淡险远、清真幽朴为多,视世所褒瑰玮壮丽者悬别,始叹古人胸心嗜古,心得难以告人,岂皮相所知?顾于鳞诗未造极,其亦咄于年命邪?”按,蒋鹏举等认为这也是一本托名李攀龙的伪书:一是李攀龙除了《选唐诗序》中对杜诗稍有涉及之外,别处未见关于杜诗的品评;而攀龙同代及后人著作中论及李氏处,皆未见言及其评点杜诗之事或引李氏评杜之语,明清两代诸家书目更是未只言片语及之。二是沈氏“识语”关于此书评语中“大较奇淡险远、清真幽朴为多,视世所褒瑰玮壮丽者悬别”之判断,完全不同于李攀龙一贯的论诗主张。三是此书中的相关评点其实是搜集蒋一葵评本《唐诗选》中的评杜语,并拼凑历代评杜语而成(《李攀龙研究》第85页,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

一、李攀龙唐诗选本版本叙录

李攀龙唐诗选本的刊刻存在《古今诗删》和《唐诗选》两大系统,根据广查明清书目著作以及在一些图书馆亲见等途径所得材料,结合相关论著已有的研究成果,其在明清两代的刊刻、传播过程之中所形成的主要版本,依照刊刻时间列举如下:

(一)《古今诗删》系统

1.汪时元刻本

三十四卷十二册,万历初年刻本。框高 20.1 厘米,宽 14.3 厘米。四周单边,白口,单鱼尾。半页九行十八字,白文。版心上为“古今诗删”四字,中为卷次、页次。每卷首页题“古今诗删卷某”,“济南李攀龙选”,“吴兴徐中行订”,“门人新都汪时元校刻”。首王世贞《古今诗删序》,序末有“王元美印”等方印。次目录,详列诗人及所选诗篇。卷十首页为李攀龙《选唐诗序》。上海图书馆亲见,全国多处有藏。

2.明刻本

三十四卷十二册^①,明后期刻本。框高 19.8 厘米,宽 14.9 厘米。四周单边,白口,单鱼尾。半页十一行二十字,白文无评注。版心上为“古今诗删”四字,中为卷次,下为页次并刻工姓氏。首王世贞序,次目录。每卷首页题“济南李攀龙选”,“吴兴徐中行订”。卷十有李攀龙《选唐诗序》。上海图书馆亲见,全国多处有藏。

3.《诗删评苑》本

三十四卷,明泰昌元年(1620)白世雍刻本。半页十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单边。每卷首页前二行题“李攀龙编,蒋一梅评,蒋一葵校释”。藏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成都杜甫草堂等地,未及亲见。

4.《诗删》本

二十三卷十册,明末朱墨套印本。半页九行十九字,白口,四周单边。每卷首页前二行题“李攀龙辑,钟惺、谭元春评”。该本删去“明诗删”部分,“古诗删”部分又多析出一卷。藏国家图书馆等 12 处,笔者亲见。

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三十四卷。保留了王世贞序、李攀龙自序,无目录。半页八行二十一字,白口,四周单边。

6.明刊钞补本

三十四卷八册,为“明刻本”抄补本,抄补的是卷十八至卷二十一。藏台北“国家图书馆”,未及亲见。

^①此本又有四册、八册装订的,笔者在上海图书馆等地皆曾见到,与十二册的内容完全相同,当是同一刻版在不同时期刷印后装订形式的不同而致。

7.旧抄本

三十四卷六册,明清间抄本,藏南京图书馆。因有损毁不能借阅,该本详情不明。

(二)《唐诗选》系统^①

1.蒋一葵笺释本

七卷附录一卷,四册。九行十八字,白口,四周单边。每卷首页题“李攀龙辑”、“蒋一葵笺释”,版心上方为“唐诗选注”四字,中为卷次,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七字为顺序。书前有李攀龙《唐诗选序》、万历二十一年(1593)晋陵吴亮《笺释李选唐诗序》。藏山东省图书馆等地,笔者亲见;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有清佚名批点蒋笺本。

2.王穉登参评本

七卷附录一卷,四册,明闵氏刻朱墨套印本。半页八行十八字,白口,左右双边。书前题“济南李攀龙选订,太原王穉登参评”,有焦竑、王穉登、李攀龙等三人序。藏复旦大学图书馆等七处,笔者亲见。

3.一初斋刻蒋一葵笺释本

七卷附录一卷,八册,明万历二十八年武林一初斋刻本。半页九行十八字,白口,四周单边。每卷首页题“李攀龙辑”、“蒋一葵笺释”,版心上方为“唐诗选注”四字,中为卷次,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七字为顺序。书前有李攀龙《唐诗选序》、万历二十一年(1593)晋陵吴亮《笺释李选唐诗序》。藏南京大学图书馆,笔者亲见。

4.集贤书舍刻蒋一葵笺释本

据杜信孚《明代版刻综录》,万历时舒石泉集贤书舍刻,书名《唐诗选》,七卷附录一卷,题李攀龙辑、蒋一葵笺释^②。

5.唐诗选玉本

此本全名《新刻钱太史评注李于鳞唐诗选玉》,七卷首一卷。半页十行十九字。据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所记,此本首页题“济南李攀龙于鳞甫编选,常熟钱谦益受之评注”,卷末有“万历庚戌秋月书刘龙田镌”牌记,可知此本刻于万历庚戌(三十八年,1610)。此本藏美国国会图书馆,未及亲见。

6.唐诗训解本

此本全名《新刻李、袁二先生精选唐诗训解》,七卷首一卷,八册,明万历四十六年居仁堂余献可刻本。半页九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单边。原题“济南沧溟李攀龙选,公安石公袁宏道校书,林献可余应孔梓”,有袁石公《唐诗训解

^①此版本系统包括的《唐诗选》刻本的具体名称和选诗数量实际上并不完全相同,但各本都明确署名以李攀龙为编辑者,各本所选的唐诗大多数是来源于《古今诗删》中唐诗部分,因此都纳入到李攀龙唐诗选版本系统的考察范围。

^②杜信孚:《明代版刻综录》,广陵书社,1981年,第27页。

序》，卷末有“万历戊午孟夏月居仁堂余献可梓”牌记。藏上海图书馆等三处，笔者亲见。

7.陈继儒校本

七卷，明刻本。半页九行二十字，白口，左右双边。首页题明李攀龙辑、蒋一葵笺释、陈继儒订。陈为万历年间著名布衣文人、编辑出版家，此本不论是托名或陈氏亲为，时间上当是万历后期。藏苏州市图书馆等四处，笔者亲见。

8.委宛斋刻陈继儒校本

七卷附录一卷，朱墨套印本。半页八行十九字，白口，四周单边。首页题李攀龙编选、陈继儒重校。今藏清华大学图书馆、安徽师大图书馆，本人亲见。

9.陈继儒校四卷本

此本包括《唐诗选注》四卷附《诸名家评说》一卷，四册，万历刻本。首页题“济南于鳞李攀龙编选，云间眉公陈继儒笺释”。书前有《题唐诗笺》，撰者残缺；又蒋一葵《唐诗选序》。书后有《唐诗选附刻诸名家评说》一卷。藏南京图书馆。因破损未能借阅。

10.李颐参阅本

此本全名《镌李及泉参于鳞笺释唐诗选》，七卷附录一卷，四册。半页九行十九字，白口，左右双边。首页题“明于鳞李攀龙编释，及泉李颐参阅，羽王陆凤翊商定，时行晏良桀梓行”。书后附有白下吴桂宇刻《诗韵辑要》。李颐，字维贞，号及泉，隆庆二年进士，晏良桀为万历年间吴县书商，此本出现的时间亦当是万历后期。藏重庆市图书馆，未及亲见。

11.孙鑛评点本

此本全名《朱批唐诗苑》，七卷附录一卷，共二册，明刻朱墨套印本。半页八行二十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四周单边。书前题“明李攀龙辑，明孙鑛评点”。孙鑛，字文融，号月峰，万历二年（1574）进士，明后期著名评点家，此本刊印当在万历、天启间。藏清华大学图书馆，未及亲见。

12.《诗坛合璧》本

此本全名《陈眉公笺释李于鳞唐诗选》，八卷，题明李攀龙辑、陈继儒笺释，有焦竑、王穉登、李攀龙等三人序。后附《唐诗联选》二卷，题王寅辑；《诗韵辑要》五卷，题李攀龙辑；《附刻诸名家评说》一卷，合称《诗坛合璧》，计十六卷四册。半页十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单边。明金陵书坊李洪宇编刻，《故宫普通书目》卷四记为万历年间刊本。今存，藏故宫博物院、台湾东海大学图书馆，未及亲见。

13.凌濛初序唐诗广选本

全书七卷，十二册^①，明凌氏盟鸥馆刻朱墨套印本。半页八行十八字，行间无分隔线，四周单边，白口无鱼尾。正文中有圈点、夹批、眉批。版心上为“唐诗

^①经过后人重新装订，册数当不是原来面貌。

广选卷某”，下为页次。书前题“明李攀龙辑，凌瑞森、凌南荣辑评”，有凌濛初《唐诗广选序》^①、王世贞《古今诗删序》、次李攀龙《选唐诗序》及吴兴凌瑞森、凌南荣识语。全国多处收藏，笔者亲见。

14. 施大猷刻陈校本

此本七卷，四册，竹纸，明天启、崇祯间施大猷刻朱墨套印本。半页八行十九字，小字双行同，四周单边，白口，无鱼尾。正文中有刻印红色圈点、夹批、眉批，篇末亦往往有评。版心上为“唐诗选”，中为卷次，下为页次。卷一首页版心下方刻“古吴金麟书”五字。此本《唐诗选》后又有《诗韵辑要》五卷附录一卷，题“明王穉登辑”；《汇释》七卷，题“蒋一葵撰”，全书共十册。《唐诗选》书前题“济南李攀龙选，云间陈继儒重校”，正文前有施凤来、李攀龙、王穉登^②等三人序及施大猷跋语。藏清华大学图书馆等十二处。另，上海图书馆亦藏此本，但无《诗韵辑要》和《汇释》，笔者亲见。

15. 黄家鼎辑刻本

此本七卷，全名《弇庵重订李于鳞唐诗选》，附有《弇庵增订唐诗评》一卷，明崇祯元年（1628）黄家鼎刻本。半页九行十八字，小字双行同，四周单边，白口。书前题“明李攀龙辑，蒋一葵笺释”。黄家鼎，东海人，字尔调，弇庵为其号，曾选刻明后期竟陵派代表谭元春的诗歌而成《谭子诗归》^③。此本今存，藏南京图书馆等三地，笔者亲见。

16. 凌弘宪序唐诗广选本

此本版式一同于凌濛初序本，以凌弘宪序代替了凌濛初序，删去了凌瑞森、凌南荣识语。《四库总目》卷193收录此本。王重民先生认为此本是凌濛初序本的翻刻，弘宪为濛初子侄一辈^④，在刊刻时间上显然应该是崇祯后期。上海图书馆等多处有藏，本人亲见。

17. 高江批点本

七卷，明崇祯刻本。半页九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单边。书前题李攀龙选、蒋一葵笺释，高江批点、黄光圃重订。藏湖北省图书馆等三地，未及亲见。

18. 刘孔敦批点本

此本全名《钟伯敬评注唐诗选》，七卷附录一卷，明末藜光堂刻本。半页十

①此序署期与内容皆有问題，详见后文论述。

②此本王穉登序与王本中的序并不相同，查其内容，是关于王穉登编辑《诗韵辑要》的原因与相关情况。

③查屏球先生在《李攀龙〈唐诗选〉评点本考索》（见章培恒主编：《中国文学评点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76-189页）一文中，认为此本刊刻者是康熙初年做过咸宁知县的黄家鼎，误。一，崇祯初的黄家鼎据《谭子诗归》书前题署是东海人，而康熙初年的黄家鼎是颍上人；二，两者时间相距近四十年，且康熙时期的黄家鼎在咸宁作知县直至康熙十年左右，后来又提拔为兵部主事，从年龄上看很难是一个人。

④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461页。

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单边,无直格。书前题李攀龙选、钟惺评注、刘孔敦批点。藏辽宁省图书馆等三地,未及亲见。

19.唐诗选汇解本

七卷四册,未附《诗韵辑要》五卷,明末服古堂刻本。半页九行二十字,正文大字顶格,笺释小字单行低一格,行间无隔行。四周双边,白口。版心上为“唐诗选”三字,中为卷次诗体,下为页次。据每卷首页题署与凡例文字,可知此本是携李徐震汇解、增订,书林李德舜梓行。此本首卷有序二首、评选姓氏、总目、凡例及诸家诗论,并附有以徐震为主的《论诗法》。全书较其所依底本新增诗58首,汇集了蒋一葵、钟惺、谭元春、唐汝询等当时评诗名家的评点,从编选的格式上看,较当时流行的其他各家《唐诗选》版本要严肃、认真得多。此本编者徐震也是明末清初著名才子佳人小说作家。藏上海图书馆等处,笔者亲见。

20.唐诗集解本

据《东北地区古籍线装书联合目录》,此本全名《唐诗选集解》,七卷首一卷,明末金闾裕兹堂刻本,题李攀龙选、钟惺评注。藏吉林图书馆。

21.唐诗合选本

据《学苑汲古:高校古文献资料库》,该本名《唐诗合选》,七卷存六册(卷六不存),题李攀龙、钟惺选评,清金陵孝友堂刻。藏苏州大学图书馆,未及亲见。又: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汉籍目录第784页著录有《唐诗合选》一目,注明为“明李攀龙、钟惺同选,明蒋一葵笺释,明刘化兰增订,明金陵孝友堂刊本”^①。金陵孝友堂乃清初著名书商吴郡宝翰楼书坊主人陈枚所设,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汉籍目录定此本为明刻本,误。此本南京图书馆藏有光绪五年重刻本,详情见下。

22.唐诗合选传经楼本

据《学苑汲古:高校古文献资料库》,该本名《唐诗合选》,七卷八册,题李攀龙辑,蒋一葵笺,钟惺、谭元春评,清初传经楼刻。藏吉林大学图书馆。

23.唐诗逆志明解本

据《山西大学图书馆线装书目录》,此本全名《李于鳞唐诗逆志明解》,七卷六册,王麟撰,清顺治间刻本^②。按,据雍正《山东通志》卷十五、乾隆《江南通志》卷二十二等所载,王麟,霑化人,崇祯十二年举人,顺治三年进士,顺治六年为青浦县知县,早卒。此本大约是其知青浦时所刻。

24.唐诗直解本

全名《庚补笺释批评唐诗直解》,七卷首一卷,四册,清博古斋刻本。首卷有序两篇、凡例、评选姓氏、总目、诗法等。正文分上下两栏,上栏题“晋陵蒋一葵笺释、竟陵钟敬伯批评、闽潭叶岑翁庚补”,三人评点分别标以“释”、“评”、

^①引自许建岷:《李攀龙文学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第314页。

^②《山西大学图书馆线装书目录》,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15页。

“补”字样;下栏题“济南李攀龙于鳞父原选、闽潭叶羲昂岑翁父纂辑、豫金詹廷对大登父校阅”,内容为诗选和叶氏直解。全书“遵于鳞先生原选,去取一无增减”^①。藏上海师大图书馆,笔者亲见。

25.唐诗直解古吴刻本

版式同唐诗直解本,藏辽宁图书馆^②。

26.唐诗直解西山堂刻本

版式同唐诗直解本,藏东北师大图书馆^③。

27.支益斋刻高江批点本

七卷,附录《诗韵辑要》五卷,清康熙三十一年支益斋刻本^④。书题李攀龙辑,蒋一葵笺释,高江批点。藏辽宁图书馆^⑤。

28.吴吴山评注本

此本书名为《古唐诗选》,七卷,清康熙三十八年宝善堂刻本。题“李沧溟原本,吴吴山附注”。有李攀龙原序,吴吴山的《附注序论》、《附注论略》,以及吴向荣(吴山子)识语,叙说该本评注与编辑体例甚详,全书对原本诗篇选择失当之处以及自己新增诗篇都有交代。吴舒凫,又名逸、仪一,字吴山,晚号吴山老人,清初文化名人。此本藏辽宁图书馆^⑥等地。

29.映雪草堂刻本

此本全名《李于鳞先生唐诗选评笺注》,八卷六册,清乾隆十二年(1747)映雪草堂刻本。半页九行二十字,黑口单鱼尾,四周单边。书前题明李攀龙辑,清潘禾评,清吴樵参。有康熙五十年(1717)潘禾序、吴樵序以及稼堂氏识。潘禾,字次耕,号稼堂,吴江人,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弟子。藏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⑦。

30.胡天仿批点本

全名《淮阴胡天仿先生批点李于鳞唐诗选》,题明李攀龙选,清胡天仿批点。全书不分卷,四册,朱墨套印。八行二十五字,无边栏,佚名朱笔过录批校。胡天仿生平不详,大约清后期人。藏中山大学图书馆,未及亲见。

31.光绪五年刻唐诗合选本

七卷六册,清光绪五年(1879)刻本。首页题“济南李攀龙、景陵钟惺选评,

①吴芳《唐诗直解序》。

②《东北地区古籍线装书联合目录》,辽海出版社,2003年,第3193页。

③《东北地区古籍线装书联合目录》,第3193页。

④据《学苑汲古:高校古文献资料库》,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此本,卷数、刊刻时间等皆同,惟“支益斋”作“友善斋”。观其字形,当是原刻字迹模糊,“支益”与“友善”中当有一乃过录笔误。惜未能亲见,不知孰是孰非。

⑤《东北地区古籍线装书联合目录》,第3185页。

⑥《东北地区古籍线装书联合目录》,第3185页。又:民国十三年上海扫叶山房曾石印翻刻吴吴山评本,时间已经是现代,姑附注于此。

⑦《香港所藏古籍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352页。

虞山钱谦益笺释,江东刘化兰增订”,封面与版心题为“唐诗合选”。书中有托名钟惺的《唐诗笺注序》,每卷首页首行题“唐诗笺注卷某”。此本杂集蒋一葵、钟惺等人的评释文字,篇目较一般《唐诗选》增加较多。藏南京图书馆,笔者亲见。

32.古唐诗选本

据《学苑汲古:高校古文献资料库》,该本名《古唐诗选》,四卷一册,题李攀龙选,清刻本。藏复旦大学图书馆,未及亲见,板式不详。

33.清世荣堂刻本

据《学苑汲古:高校古文献资料库》,该本名《唐诗笺注》,七卷六册,题李攀龙、钟惺选评,钱谦益笺释。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等地。未及亲见,板式不详。

李攀龙的唐诗选本不仅在在国内流传广泛,而且在海外也曾有过长期的流传历史。特别是在日本,从江户时代早期一直到二十世纪前十几年之间,《唐诗选》在日本有一个不断翻刻的传播过程。据平野彦次郎等日本学者的介绍,各种与《唐诗选》有关的日本刻本至少有四十余种,一些经典的日本校订本,比如江户时代徂徕学派服部南郭翻译注解的《唐诗选》版本在后世曾重印多达二十次。这些《唐诗选》版本的刻行于世,对江户时代的诗学风尚具有很大的影响,日本现代学者平野彦次郎、村上哲见、山岸共等都对此做过专门研究。在目前国内上海图书馆、辽宁图书馆等也藏有日本刊刻的《唐诗选》十余种,笔者除了在上海图书馆翻阅过四五种外,其他日本刻本都限于条件未能亲见,关于各本的基本情况也不甚了了,所以关于《唐诗选》海外尤其是在日本的版本情况本文就只能暂时付之阙如了。

二、有关《唐诗选》版本的考论

在对李攀龙唐诗选本的刊刻情况做一个简单著录后,我们可以很明确地看到他的唐诗选本的刊刻分成“古今诗删”和“唐诗选”两套版本系统,其中“古今诗删”系统共有7种不同版本,“唐诗选”系统共有33种版本。

在这个比较复杂的李攀龙唐诗选本传刻史中,首先要明确的一个问题是:哪个版本是众本之祖本?

在前文著录的《唐诗广选》本的序言中对此问题给了一个颇有传奇性的详细描述:

粤自历下《删》成,元美携其本归,吴中馆客某者潜录之,颇有轶落。他日客复馆先君子所,出其本相示,家仲叔欣然授诸梓焉,《选》始传。后元美视察吾郡,见而语先君子曰:“此当有漏。其完者子与行且校之。”先君子更从子与处请辑其原抄本,则子与时有手铅评鹭之草,犁然秘之书簏。已而《古今诗删》出,《删》只载子与名,不存其笔。此《选》与《删》各行之始末也。嗣后晋陵蒋仲舒取所为《选》笺释之,论载既详,扬榷盛备,

博雅欣赏。海内家传户习之,以为李选正矣。

这段话出自凌濛初《唐诗广选序》,对《唐诗广选》面世前有关李攀龙唐诗选本传刻情况有一个清楚的介绍:蒋一葵笺释本刊刻在《广选》之前,《诗删》又在蒋笺本前,而《诗删》前则更有一个由凌氏仲叔刻印的《唐诗选》,即李攀龙唐诗选本的最早传世版本是一个《唐诗选》版本。凌氏序的这种说法不仅在今天传世的刻本中找不到支持的证据,更重要的是序本身也是颇多疑点:一是序末署期及与之相关联的唐诗广选本刊刻时间问题。此序末署期为万历三年(1575),而凌氏生卒年为1580-1644年,因此序中申言的出版时间显然是伪托。而且序中对明后期诗坛风尚是这样描述的:“今世稍知学韵语者便思剧冒七子,见中原紫气而不攒眉者,以为外道不足与谈。……今必欲其信手拈来,随口唱出乃为天地自然之音,不过为张打油、胡钉铰开一方便门。”这里凌氏批评的显然是万历中期以后一度盛行诗坛的公安派诗风,因此也从侧面证明了序言最早也只能是作于万历后期。另外,按照中国古代刻书作序的习惯,凌濛初作此序应该是有一定名气之后。我们知道,凌濛初在天启七年(1627)、崇祯五年(1632)先后编辑出版《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因此在崇祯前期书市中具有较大的知名度,再结合凌瑞森、凌南荣识语看,序最可能的时间是崇祯前期,而唐诗广选本也即刊刻于此时。查屏球先生《李攀龙〈唐诗选〉评点本考索》^①一文虽然指出了凌序时间的不可信,但仍然认为此本在蒋一葵笺释本后而早于其他所有《唐诗选》版本,不妥。二是上面引文中关于王世贞与《诗删》关系的描述也很成问题。李攀龙卒于隆庆四年(1570)八月,王世贞“携其本归”及客抄之事,当在此后。但序中有“后元美视察吾郡”之语,由郑利华先生《王世贞年谱》看,王氏“视察吾郡”之事最有可能的是指隆庆三年为浙江参政时。如此,所谓的客抄本又当在此之前,即在李攀龙生前即有署名为李攀龙的《唐诗选》印行,这是很难想象的事。即便王世贞在李攀龙生前将其《古今诗删》携归,又与《古今诗删》刊行一事相矛盾。现知《古今诗删》的刊行是在李攀龙卒后由汪时元完成的。王世贞曾作序,序曰:“李攀龙于鳞所为《古今诗删》成,凡数年而歿,歿而新都汪时元谋梓之,走数千里以序嘱世贞。”这里说得很清楚,《古今诗删》是李死后由汪时元所刻,汪时元为徐中行女婿,曾为李攀龙、徐中行刻过书。但据《王世贞年谱》看,汪行千里寻王,其时间至早也只能是王世贞万历元年(1573)任湖南按察使时。此前,汪时元曾刻李攀龙诗集,也找过王世贞,王作《新安汪惟一徐使君子与门人也以尝侍李于鳞先生刻其〈白雪楼集〉赋二章赠之》,并未提及《古今诗删》的事。可见,李攀龙《古今诗删》遗稿为徐中行或汪时元所得,王世贞在李生前可能并未有“携归”之事,客抄之事,自然也是子虚乌有了。如果《古今诗删》为王世贞所

^①查屏球:《李攀龙〈唐诗选〉评点本考索》,章培恒主编:《中国文学澜点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有,很难想象王世贞要让凌氏于徐中行处抄写,也不会有汪氏千里携书求序之事^①。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所谓的《古今诗删》之前的《唐诗选》是不可能存在的,而现有的史料所提供的证据也与之相同。我们知道,《古今诗删》乃大约嘉靖三十五年(1556)到隆庆元年(1567)李攀龙因病家居期间编纂的,根据李攀龙和王世贞等友人书信中提到的情况看,在隆庆四年(1570)李攀龙去世前一年,此书才最终定稿,但李生前此书并未刊行,而是在万历初年才由徐中行校订并由徐婿汪时元刊刻行世的,因此在“古今诗删”系统中显然徐订汪刻本是最早的,其他各本都是由之而生的。在“唐诗选”系统中,根据上面的著录情况,可以看到万历二十一年的蒋一葵笺释本是所有各本中最早的一个。而《唐诗选》一书,正如《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九《古今诗删》提要所说的那样,“实无是书,乃明末坊贾割取《诗删》中唐诗加以评注,别立斯名”^②。所以无论是从两套版本系统的相互关系还是从各自祖本的刊刻时间看,徐校汪刻本都是全部李攀龙唐诗选刻本的祖本^③。

第二个应该加以探讨的问题是《唐诗选》的传播问题。

李攀龙唐诗选本的传播有两套版本系统,其中《古今诗删》系统的版本数量有限,刊刻历史比较简单,从中不能体现出什么特别的诗学信息。

而《唐诗选》在明清两代有30余种版本,由其构成的李攀龙《唐诗选》刊刻史颇有令人疑惑之处,即一面是诗学批评领域的不认同,另一面在社会传播层面又大行其道,这两种绝对抵牾的现象并存共生。这种情况可以再细分成明代和清代两个阶段来考察。

在明代,《唐诗选》从万历二十一年(1593)到崇祯末(1644)的短短五十一年中共有20种刻本问世,几乎每两年就有一种新版本出现,这样的刊刻频率几乎可以用空前绝后来形容,由此可以想见此书当时在社会上的流行程度。与此同时,在诗学批评领域,李攀龙诗选的传播与接受的空间实际上是十分窘迫的。我们知道,在万历中期,原本鼎盛一时的后七子随着代表人物的星云流散而趋于瓦解,这时公安派乘机崛起,以“独抒性灵”为号召,认为“诗何必唐,

①关于《唐诗广选》的第二点考证参考了查屏球先生《李攀龙〈唐诗选〉评点本考索》的有关说法。

②关于《古今诗删》和《唐诗选》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根据二书选诗的差异等,也曾有人提出不同看法,详见陈国球先生《唐诗的传承——明代复古诗论研究》(台北学生书局,1990年)第五章的相关注释部分。不过,目前学界对“诗选”来自于“诗删”基本上不再有人怀疑。

③王重民先生《中国善本书提要》中屡次提及有一个所谓的蒋一葵、唐汝询注解的《唐诗选》“祖本”。按,唐汝询万历末年刊《唐诗解》(其时大约四十馀岁),以瞽者能解诗著名。王重民先生所说“祖本”诸家书目皆未见著录,其详情如何,王氏亦未交代。此本若是存在,当是万历末以后,书商拼合蒋注、唐解而成,说是“祖本”在逻辑上很难成立。

④江盈科:《敝箴集引》,《明文海》卷二七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又何必初与盛,要以出自性灵者为真诗耳”^④,痛诋后七子李攀龙等人,“其诗文变板重为清巧,变粉饰为本色,天下耳目于是一新”^①,“学者多舍王、李而从之”^②。稍后,以钟惺、谭元春等承公安派的“性灵”余绪,继续高举反拟古大旗,形成了横跨万历、天启、崇祯三朝的竟陵诗派,影响所及,形成了“今称诗,不排斥李于鳞,则人争异之。犹之嘉、隆间,不趋步于鳞者,人争异之也”^③的局面。所以,在万历中期以后的明后期诗坛,虽然不能说没有李攀龙《唐诗选》以及七子复古格调论的支持者与同情者^④,但就这一阶段最具影响力的诗坛主流风尚看,可以说是一个反李攀龙的时代。具体到李攀龙《唐诗选》来说,评价似乎也同样是让人乐观:

李于鳞以诗鸣,而《唐诗选》一书去取乖方,靡关轨筏。^⑤

老杜律仅七篇,而首录《张氏隐居》之作,既与舆论不合,又与己调不同。英雄欺人,不当致是。

如近李于鳞选唐诗,与己所作略无交涉,若并波及其诗,则非公论也。^⑥

于鳞《诗选》,……似宗雅正,而实谬戾,学者苟不睹诸家全集,不免终为所误耳。^⑦

由此可以看出,在明后期《唐诗选》反复刊刻之际,在诗学大背景层面却也正是对李攀龙非议盛行之时。

类似的悖论也同样存在于清代。从总体上看,清人对明代尤其是明后期的文学乃至整体的文化活动与成绩,有一种掩饰不住的不以为然。这或许与政治上因清兴明亡而形成的反思式评价视角有关——由反思亡国引起对前朝政治的否定而连带引出对明代后期文化、文学等的否定,也可能是因为两朝学风、文风本身的不同而引起的,比如清前期诗坛神韵学的信奉者显然要远大于格调论的支持者,乾隆时期的考据之学与明后期的议论之风也自是两路,而清人相关的评价因此自是不大可能倾向于正面。所以,具体到我们讨论的李攀龙与《唐诗选》,自清初负面性的评论便持续不断,像钱谦益、宋荦、毛奇龄、王士禛等对之都极尽批评之能事。比如宋荦《西陂类稿》卷二七《漫堂说诗》云:

李于鳞《唐诗选》,境隘而辞肤,大类已陈之刍狗,至于专尚尖新诡僻,又似鬼窟中作活计,皆无足取。盖诗道本广大,而彼故狭小之;诗道本灵通变化,而彼故拘泥而穿凿之也。

毛奇龄在《诗辩坻》中对李攀龙、王世贞的诗歌观多有批评,并提到《唐诗

①《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九《袁中郎集》提要。

②张廷玉等:《明史》卷二八八《袁宏道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3057页。

③钟惺:《隐秀轩集》卷一六《问山亭诗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54页。

④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三一云:“李于鳞一编复兴,学者尤宗之。”

⑤胡应麟:《少室山房集》卷一一二《杂柬次公四通》其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胡应麟:《诗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91-192页。

⑦许学夷:《诗源辩体》,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368页。

选》一书,认为:

于鳞《唐选》五言古诗十四首,就唐论之,既不足以尽其技,以为古调又未然,殆不如无其选。^①

但是在这样的诗学接受条件下,据现有的资料,李攀龙《唐诗选》仍然至少被刊刻、传抄过13次,这个数字虽然比不上《唐诗选》在明后期那种两年一个版本的传刻频率,但较之一般选本来说,也算是比较出色的一个刊刻史了,至少明代绝大部分唐诗选本中很少有其他选本在清代的刊刻次数能超过《唐诗选》了。

行文至此,一个很奇怪的状况就凸现出来:在一个反李攀龙的时代,一个有着明显李攀龙特色的选本为何如此地流行于世呢?这种讶异,两百多年前的四库馆臣也同样发出过:“攀龙所选历代之诗本名《诗删》,此乃摘其所选。唐汝询亦自有《唐诗解》,此乃割取其注。皆坊贾所为,……然至今盛行乡塾间,亦可异也。”^②

我认为,产生这种奇怪状况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唐诗选》在出版界的流行与主体诗学批评风尚之间并无直接对应的关系,也即是说,推动《唐诗选》广泛流行的主要是诗学以外的因素。

之所以如此说,主要是基于以下考量:第一,李攀龙唐诗选从诗学建树上看,并不是一部识见高妙、体系严密的选本,而是一部以诗学观点引人注目的诗选,其本身就是一种诗人之选而非学者之选。《古今诗删》是李攀龙嘉靖末年废事家居时所作,当时攀龙为文坛宗主,是以才气见称的一代大诗人,而并非以学问致誉的大学者,此书的编撰在某种意义上讲可以看成是一种率性而成、以抒发乡居寂寥的寄托之作,李攀龙“诗必盛唐”的主张在此选唐诗选正文与序言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但从诗学体系构建的严密性和丰富性等方面讲,《古今诗删》在明代并不是一本出众选本。我们可以拿《唐诗品汇》来比较:《古今诗删》和编者李攀龙的关系,是后者的名声提高了前者的诗学影响力;而《唐诗品汇》和高棅之间,则是诗选提高了编者的文学史地位。两项对照,便可凸现李攀龙诗选影响力的源头何在。

而且,就像许多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古今诗删》的唐诗部分是李攀龙直接从高棅《唐诗品汇》中“选”出的,但是李攀龙的这种“选”缺少了一点学者的审慎,而多了一份诗人的随意:《唐诗品汇》中并不多见的几种错误,李攀龙基本上一样不落地带入了《古今诗删》之中,比如卷七杜甫《前出塞》9首误为7首^③,卷三七将六朝《木兰辞》题唐人韦元甫作,在《古今诗删》中完全照搬。而高棅当时身居福建一隅,又值明代开国之初,所能见到的诗选、别集有

①郭绍虞编:《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45页。

②《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二《唐诗选》提要。

③《前出塞》共九首,每篇八句四十字。万历前《品汇》各本,大都是将前二十四句作一首。

限,诗选本身又卷帙浩繁,因而不能每首入选的诗都做到精准无误,这也是可以理解的。相对应的,这些错误出现在李攀龙的诗选中就有点让人惊讶了,一则李攀龙诗选数量上没法和《唐诗品汇》比较;二则明中期唐诗刊刻的情况与明初完全不同,与高棅相比,李攀龙有更为便利的条件对诗选作基本的校勘;三则是《唐诗品汇》中虽然将六朝《木兰辞》题为唐人韦元甫作(书中题名作《木兰歌》),但在题下小注中也指出关于此诗创作时间的争议,高棅因为喜欢此诗,所以姑且选录,并后附“又歌”一首,加小注说明云:“元甫所作疑此。”因此可见,高棅处理《木兰歌》的著作权时还是比较慎重的,但李攀龙《古今诗删》中省略比较确定是唐诗的“又歌”,而将《木兰辞》径直标为韦元甫作,在前人已有提醒的情况下,这样做是非常草率的。除了对《唐诗品汇》现炒现卖,缺少选家应有的慎重之外,李攀龙在整个《古今诗删》的编纂中,私人情谊介入诗选,《明诗删》部分将汪时元诗歌入选多首。汪时元靠徐中行女婿的身份而得以在李攀龙晚年时行走其身边,有门生之谊,帮助李攀龙出版了诗歌集,汪本人诗歌创作在时人中并不见有多么出色,李攀龙却因为私人关系的原因而将汪氏诗作选入数首,这种做派显然源于诗人之性情,但却不合乎学者之规范。

第二,由《诗删》而来的《唐诗选》,本身也同样不是严肃之作,对原著采取了一种很随意的态度。这种不严肃性体现最明显的是对原书所选诗篇的处理上,下面以笔者亲见的几种版本为例,试列《唐诗选》各本选诗数量与《古今诗删》对比列表如下:

	五古	七古	五律	五排	七律	五绝	七绝	总计
古今诗删汪刻本	122	98	125	73	77	78	166	739
蒋一葵笺释本	14	32	67	40	73	74	165	465
王穉登参评本	14	32	67	40	73	74	165	465
唐诗训解本	15	51	67	40	72	73	166	486
《诗坛合璧》本	25	29	75	40	79	164	176	588
唐诗广选本	120	98	125	67	85	83	174	752
唐诗选汇解本	17	36	76	48	83	83	180	523
吴昊山评注本	18	39	90	48	100	101	208	606
唐诗合选本	115	95	183	46	189	97	202	963

通过上表可以看见,从明到清的《唐诗选》的一些代表版本,除了蒋一葵笺释本和王穉登参评本外,其他各本选诗数量千差万别,从每一种诗体选诗数量到全书总数都各不相同。即便是号称直接从《古今诗删》唐选部分全文选摘的凌氏《唐诗广选》,仍然有四种诗体的选诗数量与原本不同,总数多出了13首。另外,在表格所展示的数字能透露的信息之外,《唐诗选》各本刊刻的随意性还表现在任意增加原选本来并没有的作品(例外:汇解本和吴昊山评注本增加诗篇时都有比较详细的说明)。比如,蒋一葵笺释本比原选多出了5首,即七

古骆宾王《帝京篇》，五律杜审言《送崔融》、张均《岳阳晚眺》，七绝张谔《九日宴》、僧皎然《塞下曲》等。所以后人仔细考校《唐诗选》与《古今诗删》唐选部分的异同时，禁不住发出疑问：

李于鳞《唐诗选》，较《诗删》所录益少，中复有《诗删》所无者。其去取之意，亦不可晓。^①

因此，设若出版者都是出于对李攀龙诗学观念的认同和崇仰而刊刻《唐诗选》的，那么在诗选数量上会出现这样千差万别、一点也不尊重原著的情况吗？故而，我们可以说，《唐诗选》的反复刊刻不是因为此选的“实”，而是此选所依托的选家的“名”。像“唐诗合选本”各卷选诗数量甚至比《诗删》还要多得多，以内容看，根本就是别一种唐诗选本，但出版者仍然挂名于李攀龙名下，显然推动此本出现的是一种与诗选本身无关的因素。

第三，从选本的刊刻者身份和各本某些共同特点，我们可以找到《唐诗选》广泛流行的真正原因。以前面著录的33种《唐诗选》版本为据，除了胡天仿抄本外，刻本共有32种。其刊刻者身份可以明确地定为坊贾的有23种，他们或在书中标明书坊之名，比如武林一初斋、金阊裕兹堂；或是径题书坊主姓名，比如古吴施大猷、江东刘化兰等；其中更不乏像无锡闵氏等以彩色套印著名于世的名书坊。剩下9种《唐诗选》版本中，除了笔者因受资料所限对刊刻者身份完全无了解的“古唐诗选本”外，另外8种《唐诗选》根据其评点、笺释者的身份或版本的前后承接关系等，也都可以推知绝不可能是官刻本，大都是出于书坊所为。像唐诗直解本、吴吴山评本这两种则亦有可能是评笺者叶羲昂、吴吴山的私人自刻。同时，33种版本所涉及到的评点、笺释者，在排除重复之外，共有22人，不管是真名或伪托，也同样大都与书坊有着密切的关系。像训解本、选玉本等纷纷题署袁宏道、钱谦益、钟惺等当时的文坛翘楚为评点者或校阅者，学者们已经明确地判定为书商的托名货利之举^②。至于像蒋一葵、王穉登、陈继儒等《唐诗选》主要版本的评笺者，是明后期数量庞大的山人群体的代表，他们功名低微而博雅多艺，或为邀名自高，或为取利糊口，编刻图书都是这类人当时最常见的文化活动之一，因此他们与书坊势力有千丝万缕的利益关联，或本身即是书坊主。而像凌濛初、徐震等都是明末著名的通俗小说编辑家，受书坊请托编刻了“二拍”等明清小说名作，与坊贾关系不是一般的紧密，且凌氏家族本身就是著名的刻书之家。另外，就地理范围言，《唐诗选》32种刻本也都主要出于明清时期私人刻书业发达的南京、苏州、杭州、建阳等地。因此，从《唐诗选》的刊刻传播角度来看，推动该诗选反复传刻的主导力量，都是那些隶属于读书人阶层中较低层次的文人群体——粗通文墨的书商、功名

①许学夷：《诗源辩体》，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368页。

②查屏球先生《李攀龙〈唐诗选〉评点本考索》一文对此有详尽的考证，《中国文学评点研究论集》，第176-189页。

未遂的读书人。这些人虽然也是其时文学活动的重要构成部分,但是他们并不属于当时文坛的主流,不是主导其时诗学风尚的人群。因而,这些人可以站在主流诗学风尚之外,在商业逐利热情的支撑下,在一个反李攀龙的时代,直接推动了一个托名李攀龙的诗歌选本的大行其道。

另一方面,《唐诗选》各本本身的形式特点也可以让我们从该书受众的角度,认识到它虽不与主流诗学相洽但仍然盛行天下的原因。这种形式特点就是,现可知的33种版本中,没有一本是纯粹的白文诗选,都是带有评点或笺释的评选本。我们知道,文学评点的主体内容就是训典释义,阐发己解,或圈或点,随文演绎,多感悟式的只言片语,少深入严谨的长篇大论,且往往以助益初学为目的,如诗文评点的开创者刘辰翁称自己评点杜诗的目的在于“评以喻儿辈”^①,吕祖谦编评《古文关键》是为了“示学者以门径”^②。因此,从接受者的文化层次讲,学识丰赡的上层士大夫精英分子对文学评点的需求远远赶不上下层一般读书人的需要。在这个意义上讲,评点的基本受众是以中下层读书人和一般稍通文墨的民众为主的,在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的传播中是如此,在诗歌等雅文学的传播中同样如此。具体到本文谈论的《唐诗选》各评点本,因是书商趋利动机的产物,本身就缺乏严肃的学术态度和真诚的诗学见解,其评点、笺释文字与当时比较认真的唐诗选本《唐诗镜》、《唐诗归》等的评点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且很多时候根本就是胡乱拼凑之物,于作品本身于无发明。例如,金陵孝友堂所刻、托名钟惺选评的《唐诗合选》,其评点乃是猬集了蒋一葵笺释、钟惺《诗归》评注、托名钱谦益评注等内容的大杂烩,且不标出处,选择无序。我们由此可以想象,这些粗糙的评点本是很难吸引那些见多识广、品味典雅的上层士大夫或文化精英的。所以,33种《唐诗选》全部是比较简陋的评点本这一事实表明,与主持刊刻者中下层文人的身份特点相对应的,是接受者的范围也是限于以下层文化阶层为主的文化消费群体——四库馆臣所提到的清中期《唐诗选》仍“盛行乡塾间”的情况,正好可以证明这一点,它明确地点出了该书受众的社会层面所在。

总结来看,《唐诗选》的风行天下,是深受当时书坊商业力量影响的结果,同时也是代表了精英文化阶层之外、带有明显大众色彩的一种文化消费品味与偏好,它之所以在诗学批评层面与刊刻传播层面形成歧异不合的局面,原因也就在此。

作者工作单位:淮南师范学院中文系

①刘辰翁:《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补遗杜工部诗集》卷五《秦州杂诗二十首·其一》,高楚芳刻本。

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八七《古文关键》提要。